

# 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十年回顾

凯莉·雷利 梅根·M. 斯威尼\*

黄添祺译 张春泥 审校\*\*

**摘要：**本文回顾了过去十年有关离婚、再婚与继亲家庭研究取得的关键进展。虽然美国离婚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水平仍维持在高位，且50岁以上人群的离婚率还有所上升。再婚率虽有所下降，但由再婚构成的婚姻占全部婚姻的总体比例呈上升趋势。一方面，父母关系的转变不利于儿童的福祉；另一方面，过去十年离婚和再婚模式的变化也改变了老年人的家庭生活。本文回顾了上述趋势的成因与后果的相关研究，并探讨了这些趋势所揭示出婚姻制度的重要性所发生的变化。总的来说，近期有关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的研究指出，婚姻是一种持久的分层和制造分化的机制，家庭生活在人口上的复杂性也将持续存在。

**关键词：**儿童与儿童发展 离婚 家庭结构 再婚 继亲家庭

在美国人口学会的主席致辞上，人口学家拉里·邦帕斯（Bumpass, 1990）曾指出，没有什么变化比大多数婚姻不再白头到老这一点更彻底地改变了美国的家庭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居高不下且不

---

\* 凯莉·雷利（R. Kelly Raley），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人口研究中心副主任、科学与技术研究主任，以及得克萨斯数据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人口学、家庭、种族与族裔关系、教育、工作职业与组织、性别。梅根·M. 斯威尼（Megan M. Sweene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家庭模式、经济与家庭进程、晚年生活中工作与家庭关系。本文译自：R. Kelly Raley and Megan M. Sweeney, 2020, “Divorce, Repartnering, and Stepfamilies: A Decade in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2: 81-99。

\*\* 译：黄添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辅助生殖和家庭社会学。审校：张春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社会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调查。

断攀升的离婚率引发了家庭研究者的担忧,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首先,许多人担心婚姻的重要性正在削弱,尽管这一时期持续较高的再婚<sup>①</sup>率仍可表明人们对婚姻制度的需要。其次,由于父母离婚不利于儿童发展,离婚后的再婚会形成继亲家庭,人们担忧离婚率的上升会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最后,人们担忧离婚可能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离婚是一个分层和制造分化的生命事件:不同社会群体经历离婚的可能性不同,离婚对不同群体造成的社会后果也有所不同。离婚在低学历群体中更普遍,它对女性的经济状况带来的冲击比对男性大——除非再婚,否则许多女性的经济状况难以恢复到离婚前的水平。正因此,离婚和再婚成为代际和代内不平等传递的机制。

距邦帕斯发表上述演讲已过去30年,美国的家庭格局又发生了变化。本文将回顾过去十年学界对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的最新认识。鉴于这一议题所涉范围之广[《婚姻与家庭杂志》(*JMF*)的十年回顾特刊已经涵盖了两篇单独的文章],本文只做概览性的介绍,并聚焦在美国的最新研究成果上。首先,本文将回顾离婚和再婚的人口趋势,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趋势的影响因素。过去许多研究认为女性就业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女性就业不再与婚姻解体相关(Killewald, 2016),而此前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是离婚率上升造成女性婚姻抱有不稳定性的预期,继而导致她们提高了劳动参与(Özcan & Breen, 2012)。其次,本文将探讨离婚和再婚对成人和儿童福祉的影响,以及继亲家庭研究的最新动态。在此方面值得关注的研究结论是,离婚依旧是造成美国的母亲和孩子经济利益受损的因素(Tach & Eads, 2015)。最后,本文将探讨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模式的变化及其异质性对未来婚姻家庭生活的影响,并指出有待未来研究回答的重要问题。

---

① 在英文原文中出现了 remarriage、repartner 两种表述, repartner 指的是离婚后重新进入伴侣关系的过程,包括离婚后的同居和再婚。——译者注

## 美国离婚的人口特征

美国一直以来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预计有一半的婚姻会以离婚或分居告终（Kennedy & Ruggles, 2014; Kreider & Fields, 2002）。然而，近 30 年来，总离婚率有所下降。美国的年离婚率在 1980 年达到峰值时的水平是每 1000 名已婚女性中有 22.8 对离婚，到了 2016 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每 1000 名已婚女性中有 16.7 对离婚（Hemez, 2017）。但这一趋势是不同年龄段人群离婚率趋势的汇总，而离婚率在不同年龄段的变化趋势存在差异：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青年夫妇的离婚率已呈下降趋势（Cohen, 2019; Kennedy & Ruggles, 2014），而 50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的离婚率却在同期显著增长——从 1990 年到 2010 年翻了一番——这一现象被布朗和林（Brown & Lin, 2012）称为“银发离婚革命”。不过，年轻人的离婚率仍然明显高于老年人，上述提及的只是变化趋势在不同年龄人群的差异性。

学界目前尚不清楚形成上述离婚趋势的原因是婚姻稳定性的内在变化，还是已婚群体人口构成的变化（Lin, Brown, & Cupka, 2018）。例如，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同居而非结婚，青年群体的结婚率有所下降，尤其是低学历女性和婚外怀孕女性的初婚率明显下降（Gibson-Davis & Rackin, 2014; Schneider, Harknett, & Stimpson, 2018），而这些人群的离婚率也往往较高。这意味着青年已婚人士的构成可能转向了那些婚姻关系最稳定的群体。在美国中老年人的婚姻中，一方或双方为再婚的情况持续增加，而再婚往往不如初婚稳定（Bumpass & Raley, 2007），这可能是导致“银发离婚”上升的原因之一。与此相关，另一个重要却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中老年人的离婚率增长是由于老化或生命历程变化，还是与特定队列（例如，1946 年至 1964 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的独特经历有关。但无论原因如何，近期数据表明，“银发离婚”的增长在过去十年又有所放缓（Cohen, 2019）。

某些群体的离婚率往往比其他群体高。美国的离婚率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上升期间,黑人女性离婚率的增长比拉丁裔和非拉丁裔白人女性更为突出 (Castro Martin & Bumpass, 1989)。进入 80 年代,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离婚率差异继续扩大,拉丁裔女性的离婚率则因移民潮而降低,这是由于移民人口的离婚率往往比本土出生的人口更低 (Bean, Berg, & Hook, 1996; Raley & Bumpass, 2003)。但更晚近的研究表明,不同种族和族群的离婚率差异仍然很大 (Cohen, 2019; Copen, Daniels, Vespa, & Mosher, 2012)。其中,亚裔和外国出生的拉丁裔女性的离婚率最低,黑人、美国出生的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女性的离婚率最高。这些种族/族群差异的原因尚不明确,但很可能涉及个体、家庭和社区特征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些特征包括信仰、规范,以及经济机会等结构性因素 (Barr & Simons, 2018; Raley, Sweeney, & Wondra, 2015)。

在过去十年里,学界对同性伴侣关系的稳定性也开展了一些研究。欧洲许多国家允许同性伴侣结婚(例如,荷兰)或以其他方式将这类关系正式化并提供与已婚夫妇相似的权利和法律保护(例如,丹麦、挪威、瑞典)。2015年,美国同性恋群体争取结婚权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这不仅意味着婚姻象征意义的延续,也意味着婚姻附带的制度性支持具有价值。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针对同性婚姻稳定性的研究,这可能是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或现有数据中同性婚姻的样本量仍普遍较小 (Manning & Joyner, 2019)。既有数据通常表明,欧洲的同性伴侣同居与异性伴侣同居和异性恋婚姻相比更不稳定,但在美国,同性伴侣同居与异性伴侣同居关系的稳定性水平则相似 (Bennett, 2017; Lau, 2012; Manning, Brown, & Stykes, 2016)。在法律上承认同性伴侣关系和相关权利的国家,如美国,正式的同性伴侣关系的稳定性有时要高于异性伴侣婚姻的稳定性 (Badgett & Herman, 2013; Ross, Gask, & Berrington, 2011)。但这也可能反映的是选择性,选择登记的同性伴侣中有较大比例者是长期伴侣关系,他们只差等待法律上的承认 (Manning & Joyner, 2019)。至于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谁的伴侣关系更具不稳定性,不同的研究(包括在不同国家做的研究)

的结论尚未达成一致（Andersson, Noack, Seierstad, & Weedon-Fekjær, 2006; Kalmijn, Loeve, & Manting, 2007; Lau, 2012）。

## 离婚的主要预测因素

2010年，阿马托（Amato, 2010）曾在其对离婚研究文献的十年回顾性论文中指出了以下九个预测离婚的常见因素：早婚（青少年婚姻）、贫困、失业、低学历、婚前同居、婚前生育、跨种族婚姻、之前有过离婚经历，以及父母离异。近十年的研究又增进了我们对其中两个预测因素的认识，一是婚前同居，二是就业。此外，近期研究还关注了教育与离婚风险之间的关系。大多数这些研究不仅考察法律上的离婚，还考察了事实上的分居，原因一方面是从分居发展到离婚的平均间隔时间很短，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不同个人或群体在法律上解除婚姻关系的时间存在差异。尽管本文的关注点是离婚，但也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同居关系的解体。

### 婚前同居

婚前同居与离婚之间呈现正相关，这似乎有些反直觉，因为人们通常会认为，提前在一起生活应该有助于情侣更好地评价他们的关系并确认他们是否般配。那应该如何解释婚前同居与离婚的正相关呢？一种观点是，那些会选择婚前同居的人具有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与更高的离婚倾向相连，因此造成这类人的离婚率较高（Impicciatore & Billari, 2012; Manning & Cohen, 2012; Smock, 2000）。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婚前同居之所以使离婚风险较高是由于同居打断了人们寻找更合适配偶的过程：情侣未经深谋远虑就贸然同居，随后，又顺势成婚或奉子成婚（Stanley, Rhoades, & Markman, 2006）。第三种观点则强调了年龄的重要性：情侣开始同居时年龄越小，其最终离婚的可能性就越大（Kuperberg, 2014）。这一效应解释了相当大一部分婚前同居者的高离婚率：与没有婚前同居的夫妻相比，婚

前同居的夫妻开始同居时的年龄往往更小。即使没有婚前同居, 年龄效应依然存在: 早婚与离婚相关, 这是保守的新教徒离婚风险高的原因 (Glass & Levchak, 2014)。

最近一些研究发现, 婚前同居与离婚风险的正相关性可能正随时间推移而减弱 (Manning & Cohen, 2012; Musick & Michelmore, 2015; Reinhold, 2010)。这一发现与扩散效应的假设相一致, 即随着同居从不寻常到普遍并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扩散, 这导致同居不再限于具有高离婚倾向特征的情侣。对此, 欧洲国家有关伴侣稳定性的研究也有同样发现 (参见 Liefbroer & Dourleijn, 2006)。不过, 最近美国的研究表明, 婚前同居能降低婚后第一年的离婚风险, 却提高了随后的长期离婚风险。若将这点考虑在内, 婚前同居与离婚之间的相关性并没有减弱, 而是随时间推移保持稳定 (Rosenfeld & Roesler, 2019)。

### 女性就业

近期研究探讨了妇女就业是否会增加其离婚风险, 以及这种效应是否在年轻队列中已经减弱。在个体或夫妻层次上, 妻子的就业有时会提高离婚的可能性 (Teachman, 2010), 但这一效应会因研究情境而变。塞尔等人 (Sayer et al., 2011) 的研究发现, 妻子就业提高了她们离开丈夫的可能性, 但这一效应仅限于婚姻满意度低的女性。还有研究表明, 妻子就业与离婚的相关性仅限于发生在 1975 年之前的婚姻 (Killewald, 2016)。类似的研究还发现,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妻子赚钱比丈夫多会增加离婚风险, 但到了 90 年代妻子的相对收入则不再成为导致其离婚的显著因素 (Schwartz & Gonalons-Pons, 2016)。此外, 妻子的就业和收入与离婚的正相关性还部分包括反向因果效应: 由于预料到可能要遭遇离婚, 女性提高了她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 (Özcan & Breen, 2012; Tamborini, Iams, & Reznik, 2012)。

尽管在个体层次上对妻子就业是否削弱其婚姻的稳定性尚无定论, 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增长和离婚风险的上升很可能已经改变了

婚姻当中的制度性规范。持续上升的离婚风险让女性觉得有必要获得更多教育并在婚后持续就业，双薪家庭变为常态，而这一社会规范的转变也改变了婚内的两性分工。较之从前，妻子如今承担的家务减少了许多，而丈夫承担的家务增加了一点（Bianchi, Sayer, Milkie, & Robinson, 2012）。妻子就业和获得收入不再被污名化，如今也不再成为致使其婚姻破裂的原因，婚姻中性别角色期待的变化部分解释了女性收入和离婚之间相关性减弱的原因（Schwartz & Gonalons-Pons, 2016）。另一项研究的证据也支持了这一点，妻子对家务的相对贡献能够降低 1975 年之前婚姻的离婚风险，但对晚近队列婚姻的离婚风险则没有影响（Killewald, 2016）。不过，尽管妻子在婚姻中的角色期待已有所变化，丈夫的全职就业仍然与较低的离婚风险呈强相关（Killewald, 2016）。

### 受教育程度

在美国和许多其他社会中，受教育程度与离婚风险呈负相关（Aughinbaugh, Robles, & Sun, 2013; Harkonen & Dronkers, 2006; Lundberg, Pollak, & Stearns, 2016; Martin, 2006; Matysiak, Styrc, & Vignoli, 2014; Prince Cooke & Baxter, 2010; Raymo, Park, Xie, & Yeung, 2015）。在美国，46 岁及以下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群中，约 21% 的男性和 32% 的女性会经历离婚，相比之下，在没有取得高中学历的男性和女性中，这一比例分别为 44% 和 52%（Aughinbaugh et al., 2013）。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美国不同学历群体的离婚率差异持续扩大，尤其在白人当中（J. Kim, 2012; Martin, 2006; Schwartz & Han, 2014），但我们对这些差距在近年来的变化知之甚少。在欧洲，受教育程度与离婚之间的负相关通常出现在离婚更普遍的国家或时期，这可能是因为离婚的普遍性降低了离婚的社会和经济成本（Harkonen & Dronkers, 2006; Matysiak et al., 2014）。较之许多西欧国家，美国未受过本科教育的已婚或同居母亲更可能与配偶/伴侣分居，而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分居的可能性却并不比西欧同类群体高（Musick & Micheltore, 2018）。

如前所述, 结婚年龄与离婚风险呈强负相关 (Kuperberg, 2014)。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离婚风险低的部分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通常在完成学业后, 也就是年纪更大时才结婚。不过, 结婚年龄仅解释了受教育程度对离婚风险影响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个可能重要的解释是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 与经济困难呈负相关。家庭压力模型提出的理论解释是, 夫妻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减轻经济压力, 经济压力的减少会提高家庭生活的质量 (Conger, Conger, & Martin, 2010)。这一夫妻收入、婚姻的质量以及离婚风险之间的理论关系在一些实证研究中得到了支持 (例如, Boertien & Härkönen, 2018; Raymo, Fukuda, & Iwasawa, 2013), 但这些研究同时指出, 不同受教育程度者之间婚姻质量的差异实际上很小, 与结婚年龄的效应类似, 这些差异只能解释不同学历者离婚风险梯度的一小部分。此外, 许多研究发现收入和离婚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例如, Killewald, 2016; Schwartz & Gonalons-Pons, 2016)。美国经历经济大衰退甚至导致了离婚率的短期下降 (Amato & Beattie, 2011; Cherlin, Cumberworth, Morgan, & Wimer, 2013; Cohen, 2014)。丈夫赢得彩票会增加其婚姻的稳定性, 但这一效应并非来自婚姻满意度的增加 (Boertien, 2012)。

总之, 认为提高受教育程度就能够减少经济困难和压力, 提高婚姻质量, 从而减少离婚风险的观点的实证基础相当薄弱。实际上, 很难说低收入会增加离婚风险, 而且失业还可能 (暂时) 让夫妻在一起。波尔蒂安和哈克宁 (Boertien & Härkönen, 2018) 认为, 与其说教育、收入和财富是通过减少财务压力和提高婚姻质量来降低离婚风险, 不如说这些因素增加了离婚的难度。他们的研究指出, 许多高学历、高收入的夫妻之所以维持他们的婚姻, 是因为离婚会威胁到他们的财产和消费模式 (例如, 房屋所有权)。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财富、消费模式与离婚之间的关联。另外, 伦德伯格等人 (Lundberg et al., 2016) 提出, 对孩子养育的密集投入 (如时间和经济上的投入) 也与婚姻的长期稳定性有关, 而密集养育投入在高教育群体中尤其普遍。这也是未来研究可以探讨的重要议题。

## 再婚和再进入伴侣关系的人口特征和影响因素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再婚率下降了约一半，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经历了陡降（Schweizer, 2019）。仅 2008~2016 年间，再婚率就从每 1000 名离婚或丧偶成年人中 33 对再婚下降到 28 对（Payne, 2018）。尽管再婚率一再下降，但人口中潜在的再婚者人数仍在上升（初婚以丧偶或离婚结束的人群），这意味着截至 40 岁或 50 岁时有过再婚经历人群的比例就算是到了 21 世纪中期的出生队列也只是略有变化（作者的统计）。事实上，最近几十年，一方或双方为再婚的婚姻占全部婚姻的比例有所增长，部分原因来自初婚率的下降。在 1960 年，只有 13% 的已婚人士属于二婚或多次婚姻，但到了 2013 年这个数字上升至 23%（Livingston, 2014）。近年来，新增的婚姻中有大约 40% 属于夫妻一方或双方是再婚的情况（Lewis & Kreider, 2015; Livingston, 2014），这表明即便经历初婚或二婚的失败，美国人仍然相信婚姻（Cherlin, 2009）。

然而，随着近年来初婚率和离婚率的下降，人口中潜在再婚者的比例也开始下降。1996 年，分别有 32.6% 和 26.8% 处于 35~39 岁的女性和男性符合再婚条件，即他们曾经结过婚但初婚已解体（Kreider & Fields, 2002）。在 2008~2012 年间，女性和男性的这一数字下降到只有 28.5% 和 22.0%（Lewis & Kreider, 2015）。总体而言，随着具有高离婚率特征的婴儿潮一代逐渐被更年轻的出生队列所替代，再婚率和潜在再婚人口比例的下降都预示着再婚人口比例将逐渐下降。然而，曾有过再婚经历的人口比例尚未显著下降，因为人口的老齡化以及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再婚。尽管如此，这些趋势表明，美国未来的人口中选择再婚的比例将会减少，不过，稳健的同居率表明许多人在结束婚姻关系之后仍会进入非婚的伴侣关系。

遗憾的是，我们对离婚后重新进入广义上的伴侣关系（再婚或非婚同居）的趋势知之甚少，因此，也不清楚非婚同居率的上升能否补偿再婚率

的下降。2002年,45岁以下的再婚女性中有超过2/3在其再婚前有同居行为(Teachman, 2008),而在50岁以上的离婚女性中,有将近一半在1998年至2014年间先同居后再婚(Brown, Lin, Hammersmith, & Wright, 2019)。然而,目前仍缺乏总体上反映再婚模式的数据。全国家庭成长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和健康与退休调查(Health and Retirement Survey)各自对受访者年龄的限制使其难以研究全年龄段的再婚模式,但如果能将这两个数据相结合,则能得到理解上述家庭变化的绝佳信息。

尽管如2010年的十年回顾文章(Sweeney, 2010)曾指出的,对再婚和重新进入伴侣关系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但近期已有一些研究探讨了什么人更可能再婚或重新进入伴侣关系。在美国,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再婚,尽管这一性别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Livingston, 2014; Payne, 2018)。再婚行为的性别差异也随年龄而改变:男性的再婚优势会随年龄增长而提高(Livingston, 2014; H. Wu, 2017),如果将非婚同居也算作重新进入伴侣关系,男性在中年及以后的再婚优势更为明显(Brown et al., 2019)。

放眼美国之外,有些国家会将再婚和同居都作为重新进入伴侣关系来研究,有大量研究表明,在许多国家,母亲重新进入伴侣关系的比例低于父亲(例如,Di Nallo, 2019; Gatezewska, Perelli-Harris, & Berrington, 2017; Gray, 2015; Ivanova, Kalmijn, & Uunk, 2013)。然而,一些证据表明,只有当父母与子女同住时,父母身份才对重新进入伴侣关系起阻碍作用(例如,Beaujouan, 2012; Vanassche, Corijn, Matthijs, & Swicegood, 2015)。多个国家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没有孩子时重新进入伴侣关系的概率相似(例如,Beaujouan, 2012; Di Nallo, 2019; Gray, 2015; Ivanova et al., 2013)。施诺尔等人(Schnor et al., 2017)以比利时监护权的法律变化为情境,发现对孩子拥有单独监护权的弗拉芝(Flemish)<sup>①</sup>母

① Flemish 特指比利时北部弗拉芝大区(荷兰语区)居民。——译者注

亲再进入伴侣关系的可能性低于与孩子父亲共同承担监护权的母亲，尽管单独监护权的母亲具有其他一些与高再婚率相联系的特征（如高家庭负荷）。最近一项对英国母亲重新进入伴侣关系的研究发现，对于在婚姻或同居关系内生育孩子的母亲而言，父亲的育儿参与对母亲离婚后的再婚并没有显著影响（Berger, Panico, & Solaz, 2018）。

许多研究还关注到不同学历、种族和族群的再婚模式差异。由于上学的人会等到毕业后才结婚，受教育程度是初婚推迟的影响因素，但受教育程度对再婚的预测作用较弱，尤其对于女性（Shafer & James, 2013）。在成年早期就经历离婚的人群中，不同教育程度者的再婚率梯度可能会持续扩大，因为低学历者进入再婚最迟（McNamee & Raley, 2011）。但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女性重新进入伴侣关系却最快（McNamee & Raley, 2011），这可能是因为她们的需要通过建立伴侣关系来获取经济资源（Shafer & James, 2013）。教育还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影响再婚和重新进入伴侣关系的过程，比如影响人们对新伴侣的筛选标准。例如，比利时的研究表明，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与他们在离婚后的父职安排相关，影响他们是选择与无子女的女性再婚还是选择成为继父（Schnor, Vanassche, & van Bavel, 2017）。在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比拉丁裔和黑人女性更快再婚和重新找到伴侣（McNamee & Raley, 2011）。初婚所体现出来的种族和族群间的婚姻模式在再婚中也更加明显，即白人与黑人通婚的情况更少，但白人与亚裔、白人与西班牙裔通婚在再婚中比在初婚中更常见（Choi & Tienda, 2017）。白人更倾向于与亚裔和西班牙裔再婚，而非与白人再婚，这可能是由于离婚的经历限制了他们在婚姻市场上的选择（Qian & Lichter, 2018）。

## 离婚与再进入伴侣关系的后果

### 成年人的福祉

离婚与成年人的福祉密切相关，但相关程度因不同的福祉类型、性

别、生命历程阶段和社会情境而异。这些变异性揭示了社会环境在塑造离婚后果上的重要性。虽然离婚造成的短期经济损失不像从前那般严重,但离婚仍会给母亲和孩子在短期内造成实质性的经济资源紧缺 (Osborne, Berger, & Magnuson, 2012; Tach & Eads, 2015)。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单亲母亲的家庭收入在离婚后第一年下降了 42%;到了 21 世纪 10 年代,这个数字降至 33% (Tach & Eads, 2015)。离婚前后女性劳动力参与和劳动收入的增加是其离婚前家庭收入增加和离婚后家庭收入恢复的原因 (Tamborini, Couch, & Reznik, 2015)。

离婚对经济福祉还会产生长期影响。尽管离婚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和收入均会在离婚后持续增加多年 (Tamborini et al., 2015),但离婚仍然不利于中老年妇女的财富积累 (Addo & Lichter, 2013),也会提高女性的贫困率,在 50 岁后离婚且未再婚的女性中,有 27% 处于贫困状态,而这一比例在同样情况的男性中仅为 12% (Lin, Brown, & Hammersmith, 2017)。劳动力市场中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优势地位意味着对女性而言,再婚可能是比提高劳动参与更有效的恢复经济状况的途径,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对需要抚养子女的女性尤其如此 (Jansen, Mortelmans, & Snoeckx, 2009)。在美国,如果第二次婚姻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女性通过再婚还可以享受第二任丈夫的社会保险福利 (Lin et al., 2017)。

之所以女性在离婚后的经济损失更严重主要是因为在大多数家庭中男性仍然是主要的养家人。尽管与过去相比,如今的女性通常持续就业,而且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已经缩小 (部分原因是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但男性的收入仍然高于女性,尤其是父亲的收入一般要高于母亲。

离婚还与成年人的健康和幸福感相关。要理解这类关联,一个常见的分析框架是区分选择性与危机和资源这两类因果关系。一方面,婚姻破裂给个人带来的短期动荡和危机可能会导致幸福感下降;另一方面,离婚也剥夺了个人从婚姻中曾经得到的物质、精神和社会资源,从而带来长期的健康负面影响。过去十年中已有大量研究提供了支持危机模型的证据,特别是在心理健康方面。许多高质量的追踪数据研究基于追访数据和固定效

应模型的方法识别了离婚对人们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短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为人父母群体的影响（Hewitt, Turrell, & Giskes, 2012; Kalmijn, 2017; Leopold, 2018; Osborne et al., 2012; Williams & Dunne-Bryant, 2006）。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到的因素，如早已存在的抑郁倾向。这些研究通常表明离婚者的心理健康等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恢复，这一点也与危机模型相一致。但也有一项针对瑞典男性的研究发现，再婚未能降低离婚者的抑郁程度（Hiyoshi, Fall, Netuveli, & Montgomery, 2015）。

离婚是否会导致身体健康的短期恶化尚无定论。离婚后死亡率会立即上升（Rendall, Weden, Favreault, & Waldron, 2011），但这未必是身体健康的恶化而造成的，也可能是意外身故或自杀。此外，由于以死亡作为因变量无法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也很难排除选择性因素。一项对挪威行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分析的研究发现，在离婚当年，离婚者请病假天数在短期内出现了急剧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和无子女女性请病假天数有所回落，但对有子女的女性则仍有持续影响（Dahl, Hansen, & Vignes, 2015）。目前仍不清楚这一研究发现反映的是人们因身体健康问题而请病假，还是因为心理情绪问题而请病假。此外，一些研究发现，离婚有时候还可能带来身体健康的短期改善（Leopold, 2018; Monden & Uunk, 2013; Williams & Umberson, 2004）。

由此可见，危机模型似乎更适用于解释离婚与心理健康和总体幸福感的关系，而非与身体健康的关系（Kalmijn, 2017）。离婚与身体健康不佳之间的关联（Liu & Umberson, 2008）可能完全是由选择性造成的，也可能是婚姻的健康效应不容易在大多数固定效应模型中被识别。若根据婚姻资源模型，婚姻的好处或单身的代价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累积，最终形成了离婚者较之在婚者更差的健康状况（Hughes & Waite, 2009）。大多数固定效应分析可能有助于识别短期内健康状况的大幅波动，却难以捕捉缓慢的、可能需要几十年的过程才能在测量上显现出来的健康水平的下降。近期使用婚姻传记的研究发现了离婚与晚年健康轨迹的恶化相关，这一效应

不仅针对离婚者,再婚人群的健康轨迹也较差,尽管再婚者比未再婚者还是要更健康一些(Hughes & Waite, 2009; O'Flaherty, Baxter, Haynes, & Turrell, 2016)。由于数据的限制,这些研究很难通过严格控制选择性因素来评价婚姻经历的长期影响。但美国最近一项研究支持了婚姻资源的解释路径,其基于对调查数据和行政数据的固定效应分析发现,离婚在长期上会导致未再婚男性的工作障碍,但这些负面影响要等到离婚20年后才显现(Couch, Tamborini, & Reznik, 2015)。这些发现表明,否定婚姻资源模型还为时尚早。

社会情境因素在离婚和再婚对健康的影响中起重要调节作用。在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离婚与健康自评之间的负相关有所上升(Liu & Umberson, 2008),而且如前所述,离婚对为人父母者的健康负面影响似乎更大(Dahl et al., 2015; Kamp Dush, 2013; Williams & Dunne-Bryant, 2006)。也有研究认为,与美国社会相比,离婚的负面影响在更强福利体系支持或不太重视婚姻的社会中可能更弱(Kalmijn, 2017)。

### 后代的福祉和成就

近十年来,学界已经不再把父母离婚和再婚作为儿童生活中的孤立事件来研究,而是开始探讨儿童经历不稳定和多样化的家庭和居住安排的累积影响。近年来,以儿童母亲进入和退出同居和婚姻关系的次数来衡量,美国儿童经历家庭不稳定的总体水平略有增长(Brown, Stykes, & Manning, 2016; Rackin & Gibson-Davis, 2018)。家庭不稳定性的增长主要发生在黑人儿童和母亲为低学历的儿童中,这一变化进一步扩大了现有家庭不稳定性在不同种族和学历群体之间的差距(Brown et al., 2016; Rackin & Gibson-Davis, 2018)。同居在当今美国儿童所经历的家庭不稳定性中起着核心作用,父母同居会使白人儿童的家庭不稳定性增加80%,使西班牙裔儿童的家庭不稳定性增加50%,让黑人儿童的家庭不稳定性几乎增加了一倍(Brown et al., 2016)。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母亲的伴侣关系,而是把导致儿童家庭不稳定的更多来源均考虑进来,如父母以外的成员进入

或离开家庭，那么儿童家庭环境不稳定性的估计值会进一步增加，尤其对于黑人和西班牙裔青少年以及母亲为低学历的青少年来说，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更为明显（Perkins, 2017; Raley, Weiss, Reynolds, & Cavanagh, 2019）。

大量研究表明，儿童面临的家庭结构转变越多，他们的平均福祉水平越低（近期综述可参见 Cavanagh & Fomby, 2019; Hadfield, Amos, Ungar, Gosselin, & Ganong, 2018）。这一结论适用于儿童福祉的各个方面，包括问题行为（如 Cooper, Osborne, Beck, & McLanahan, 2011; Fomby & Mollborn, 2017; Fomby & Sennott, 2013; Mitchell et al., 2015）、健康（Bzostek & Beck, 2011; Smith, Crosnoe, & Cavanagh, 2017）、心理福祉（如 Bzostek & Berger, 2017; Lee & McLanahan, 2015），以及成年后的社会经济成就与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如 Amato & Patterson, 2017; Bloome, 2017; Fomby, 2013; Fomby & Bosick, 2013）。既有文献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家庭不稳定与后代福祉下降之间关系的解释，集中的解释包括经济资源的变化、养育方式和情绪压力，但支持这些机制的实证证据依然很有限（Cavanagh & Fomby, 2019）。此外，选择性对上述关联的影响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一些未观测到的因素可能同时导致了这些父母和孩子经历家庭不稳定性 and 儿童的负面结果。

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家庭不稳定对后代福祉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家庭不稳定性似乎对白人青少年和家庭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青少年的福祉产生了更大的负面影响（Bernardi & Radl, 2014; Cavanagh & Fomby, 2019; Fomby & Cherlin, 2007; Perkins, 2019; Ryan, Claessens, & Markowitz, 2015; 另见 L. L. Wu & Martinson, 1993），对父母婚内生育的子女的负面影响也更大（Bzostek & Beck, 2011; Bzostek & Berger, 2017; Ryan & Claessens, 2013）。这些差异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很可能是这些群体经历家庭不稳定性的可能性相对较低，经历未曾预料到的恶性事件会导致更坏的后果，或是这些经历家庭不稳定性事件的父母和孩子在背景特征上有更大的选择性（Bernardi & Radl, 2014; Cavanagh & Fomby, 2019;

Turney, 2017)。其他可能的解释还包括离婚的平均经济后果或与不同住的亲生父母的关系性质。

从累积不稳定性的取向来研究儿童家庭结构环境具有概念和实证方法简洁性上的优势。从“不稳定性和变化”的角度出发,测量家庭转变次数是相对直接的方法(例如,L. L. Wu & Martinson, 1993)。这一取向的另一个优势是能够囊括更一般性的影响儿童家庭环境的不稳定性和变化来源,不局限于父母的离婚或再婚。

然而,这一取向也有其局限性。这类研究经常未能区分转变是否涉及婚姻,却隐含了进入和退出婚姻关系对儿童福祉具有同样影响的假定。但这一假定与既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不相符,大量文献指出父母的婚姻与儿童发展的积极结果相关(例如,Ribar, 2015)——尽管其因果性仍存争议。还有相关证据表明,儿童所获得的经济和养育资源取决于父母婚姻转变的性质(例如,Osborne et al., 2012)。此外,如前所述,家庭不稳定性是否会降低儿童福祉也取决于婚姻转变的类型(也可参见Lee & McLanahan, 2015; Ryan et al., 2015)。

后续研究应更多关注家庭转变的类型、家庭不稳定性对后代福祉影响的异质性,以及这些效应实现的机制(例如经济和养育资源)——无论是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儿童还是不同方面的福祉——这或许能为识别因果路径提供重要线索。后续研究还应考虑儿童在更大的家庭环境中所面临的不稳定性,包括其与父亲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更多地关注家庭 and 家户成员构成的复杂性,包括儿童在多个家庭中生活的时间长度。定性研究或有助于从儿童和家庭特征中理解这些过程中的变化。如今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布勒(Buehler, 2020)回顾的家庭科学研究文献中有关家庭风险、优势和抗逆力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以识别父母关系组建和解体如何与儿童福祉联系在一起的独特机制。

为了更好地控制离婚父母及其子女具有的潜在选择性特征,近期研究还采用了更严格的统计方法来探讨父母离婚与儿童福祉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基本证实了既有文献的发现,即父母离婚与儿童福祉的降低有关,但

较之采用传统方法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估计出的负面影响通常更弱（McLanahan, Tach, & Schneider, 2013）。例如，金（Kim, 2011）使用匹配方法和增长曲线模型发现，离婚会对儿童的数学测试成绩和人际交往技能产生负面影响。布兰德等人（Brand et al., 2019）使用倾向值分析表明，越是对于父母不太可能离婚的家庭，父母一旦离婚对子女教育成就的负面影响越大 [但格莱茨（Grätz, 2015）的研究使用兄弟姐妹固定效应模型在德国却发现了不同的模式]。综合来看，这些研究证实了父母离婚对儿童福祉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因果关系。然而，所有这些研究仍依赖于无法直接检验的假定，尤其假定决定儿童福祉的因素中未观测到的部分与家庭结构的变化相联系。不过，对此可以进行敏感性分析，以衡量对未观测变量的不同假定是否对结果具有稳健的影响，这类工作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离婚对儿童产生影响的因素。只有更好地了解经历家庭不稳定者及其子女所预先具有的选择性是什么性质，才能明确家庭转变对后代福祉的因果效应。

最后，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父母离婚后的监护安排（如共同监护与单独监护）与儿童福祉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同研究的结论不同，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共同监护安排能略微改善儿童的处境（近期综述见 Baude, Pearson, & Drapeau, 2016; Steinbach, 2019）。随着共同监护安排日益普遍（如 Cancian, Meyer, Brown, & Cook, 2014），这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更广的研究视角来说，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关注在复杂和持续变动中的家庭 and 家户环境中生活的儿童，包括要关注有大量儿童是在多个家庭中生活的事实。

## 继亲家庭

继亲家庭是由再婚或重新组建伴侣关系形成的，且包含至少一名伴侣与前任生育的孩子的家庭，这一结构导致继亲家庭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收入和项目参与调查（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从儿童视角提

供了继亲家庭的数字: 2009年, 美国18岁以下的儿童中有7.5% (总共560万名儿童) 与处在同居或婚姻关系中的继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个数字从1991年以来仅略有增加, 当时是有7.0%的儿童与继父母生活在一起 (Kreider & Ellis, 2011)。“拼盘家庭” (blended family) 这个词指的是那些包含继父母、继兄弟姐妹或同父异母 (或同母异父) 兄弟姐妹关系的家庭。2009年, 大约1.7%的18岁以下儿童与至少一名继兄弟姐妹 (继父母的亲生子女) 生活在一起。大约10.8%的儿童至少与一名同父异母 (或同母异父) 的兄弟姐妹 (其亲生父母与别人生育的子女) 生活在一起 (Kreider & Ellis, 2011)。据估计, 17%到19%的同性伴侣家庭中有儿童与之共同生活 (Gates & Cooke, 2011), 但由于数据所限, 尚无法确定有多少比例的儿童是在之前的伴侣关系中生育的 (Ganong & Coleman, 2018)。

美国社会对继亲家庭关系中的期待和义务仍缺乏明确的规范 (Cherlin, 1978; Ganong & Coleman, 2017)。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 人们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称呼继亲关系, 例如, 把继父称为“我母亲的丈夫”。一些证据表明, 孩子使用“继”的称谓取决于他们与不同家庭成员间的关系, 并且在家庭内部也可能随时间而变化。例如, 与亲生母亲关系好的青少年更可能使用“继父”这一称谓, 而与不住在一起的亲生父亲关系亲近的青少年则不太可能使用“继父”这一称谓 (Thorsen & King, 2016)。重要的是, 青少年如何称呼其继父似乎更多取决于他们与亲生父母的关系, 而非与继父本人的关系; 而且他们还更可能将符合传统祖父母角色期望的继祖父母直接称为“祖父母” (Chapman, Coleman, & Ganong, 2016)。除了反映继亲家庭中的关系性质外, 指代继亲 (step-kin) 的各种称谓变化也给试图统计或研究继亲关系的学者带来了挑战, 因为仅通过使用“继”的标签来识别可能会遗漏一部分继亲属关系 (stepkin relationships) (Seltzer, 2019)。

在过去的十年中, 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继亲关系的性质。这些研究证实了继亲关系通常不如亲生关系亲密的既有观点, 但也揭示出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例如, 子女与其亲生母亲之间的关系、

母亲与继父之间关系的质量会影响子女与其继父之间关系的质量以及青少年对继亲家庭的归属感 (Jensen & Howard, 2015; Jensen & Shafer, 2013; King, Amato, & Lindstrom, 2015; King, Boyd, & Thorsen, 2015; King, Thorsen, & Amato, 2014)。继子女与继父母的关系还受到继子女的年龄、继子女和继父母的性别、相处的时间以及父母监护安排等因素的影响 (Becker, Salzburger, Lois, & Nauck, 2013; Ganong, Coleman, & Jamison, 2011; Kalmijn, 2013)。

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老年父母与其成年继子女之间的动态关系。居住距离更近,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更可能存在定期经济和照料往来。相较于亲生母亲与其子女的关系,成年继子女和继母之间更不可能同住或住得很近 (Seltzer, Yahirun, & Bianchi, 2013)。虽然拥有继亲关系也会增加可用的亲属关系,但研究发现,有继亲关系的家庭相比其他家庭更不可能参与代际资源传递,尤其是在照料方面 (Wiemers, Seltzer, Schoeni, Hotz, & Bianchi, 2019)。然而,荷兰的研究表明,如今 (2009 年) 的中老年继父母较之过去 (1992 年) 更有可能将继子女视为其人际网络的一员 (Suanet, van der Pas, & van Tilburg, 2013), 这表明继亲关系可能随时代推移而愈加“制度化”。诺埃尔-米勒的研究 (Noël-Miller, 2013) 发现,继父母与成年继子女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继父母与子女亲生父/母的婚姻关系的存续,不过目前对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在其结束与继子女的亲生父母的婚姻关系后还能持续到什么程度的研究仍然较少。

最近,“银发离婚”的增长引发了学界对中老年人继亲关系的研究兴趣。中老年之后形成的继亲家庭可能会面临许多特殊的挑战,包括遗产继承、老龄照料以及面对与前任和子女之间更复杂的长期人际和亲属关系网络 (Papernow, 2018)。在 50 岁以上的已婚群体中,再婚 (非初婚) 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19% 上升到 2015 年的 30% (Lin et al., 2018)。近年来,在至少一方年龄超过 50 岁的同居伴侣中,有 41% 至少有一个孩子是与前任所生。在这些中老年人的继亲家庭中,有 87% 属于再婚,其余 13% 属于

同居 (Lin et al., 2018)。与没有子女的再婚家庭相比, 继亲家庭, 尤其是非婚同居的继亲家庭, 往往在经济和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不过, 如控制这些社会经济构成的差异, 各类家庭的关系质量相似 (Lin et al., 2018)。

继亲家庭的结构复杂性还可能来自多代关系, 在过去十年中, 学界对继祖父母身份的关注也有所增加。一般继祖父母身份的形成有两种途径: 一是与已有孙辈的对象结成伴侣关系, 二是子女与有孩子的对象结成伴侣关系。美国人口中拥有继孙子女的可能性正随出生队列推移而增加, 而且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和黑人中更为常见 (Yahirun, Park, & Seltzer, 2018)。尽管有证据表明, 继祖孙之间的联系普遍弱于亲祖孙之间的联系, 但不同的继祖孙之间的关系性质差异相当大 (Chapman et al., 2016; Ganong & Coleman, 2018)。

##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从过去十年学界有关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的研究中, 我们对美国家庭生活的变化已形成了哪些认识? 本文开篇就已指出, 由于美国的总体离婚率在下降, 尤其在年轻人当中, 这意味着以离婚而解体的婚姻占比也会逐渐下降 (Cohen, 2019)。然而, 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使我们推测夫妻关系不会再如从前那样稳定。

一是经济条件优越的情侣更可能步入婚姻, 这导致与其他伴侣关系相比, 婚姻关系更高的稳定性要部分归结于婚前的选择性 (Tach & Edin, 2013)。二是从长期趋势来看, 伴侣关系的稳定性——广义上包含婚姻和同居——仍不太明确 (Cherlin, 2017)。由于同居与婚姻有诸多不同, 如果不将同居关系的增长考虑在内, 则无法理解家庭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 同居关系变得越来越稳定 (Cohen & Manning, 2010), 但至少在美国, 同居关系的持久性仍然明显不及婚姻 (Musick & Michelmore, 2018), 这意味着人们从结婚转向同居会成为家庭关系不稳定性增长的来源。

几十年来, 学界一直将高再婚率作为美国人对婚姻制度仍有强烈认同

的证据 (Cherlin, 2009)。美国的再婚率长期居高，但如今正在下降。这是否表明美国人对婚姻的认同正在减弱？初婚模式表明并非（尚未）如此。虽然年轻人在不断推迟初婚，但到目前为止，除黑人女性外，美国女性在 40 岁之前结婚的比例仅小幅下降 (Raley et al., 2015)。此外，最近对同性婚姻的研究表明，婚姻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制度性的意义。离婚率的下降表明那些能够结婚的人更可能将婚姻作为终身承诺，婚姻对这些人而言仍具有吸引力，即便结婚的人口比例在减少。虽然婚姻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制度，但种种迹象都表明，能够进入稳定婚姻的人将越来越限定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群体（例如，Cherlin, 2004；Cohen, 2019），与初婚类似，再婚在拥有经济优势的人群中也更为常见。

过去十年的研究表明，婚姻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是性别化的。离婚对女性造成的经济损失仍明显大于男性 (Kalmijn, 2015；Tach & Eads, 2015)，同居解体对女性经济福利造成的损失也在增加 (Tach & Eads, 2015)。不过女性的收入，即便高于她们的丈夫，也已不再增加她们的离婚风险 (Schwartz & Gonalons-Pons, 2016)。但与此同时，丈夫的全职工作却对稳定的婚姻仍至关重要 (Killewald, 2016)。

过去十年的研究也提供了关于离婚和家庭不稳定对成人及儿童影响的新洞见。目前已有较强的证据表明，离婚对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负面影响——虽然这些负面影响是暂时的。但离婚对身体健康证据还是不足，也许是因为这些研究关注的是短期后果，而离婚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后果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在过去十年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试图更好地了解离婚和家庭不稳定对儿童的影响。有相当多的研究从家庭生命历程的角度出发，关注家庭变化的累积史，并采用更为严谨的研究设计去控制父母和家庭既有特征的选择性。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发现，虽然家庭不稳定与儿童福祉之间的某些统计关联可能是伪相关，但离婚和家庭不稳定无疑会损害儿童的福祉。与此同时，对儿童负面影响的严重程度在不同个人和群体之间会存在很大差异。研究表明，家庭不稳定对最不可能经历这些事件的青少年

(如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较好或在婚内生育的青少年) 的负面影响最大。这一重要发现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后, 未来研究要增进对家庭稳定性的变化及其后果的理解, 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应更多关注与家庭生活相关的法律环境的变化(如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二是应加强对当代复杂伴侣关系和家庭组成方式的描述性和定性研究, 包括儿童与单亲或继亲父亲、兄弟姐妹关系, 以及童年在多个家庭中居住的情形。类似地, 近期学术研究聚焦于继亲家庭形式和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多样性, 包括继父母进入中老年后的家庭关系。关注中老年家庭的继亲关系能够增进对家庭的理解, 这包括理解婚姻不稳定性的长期后果, 以及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关系的持续性。

过去十年有关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研究的一大推进是对非婚关系, 特别是对同居关系给予了更大的关注。与此同时, 对婚姻本身仍然给予了同样高的重视度。虽然邦帕斯在美国人口学会发表演讲时, 一些人会担忧离婚率的上升预示着婚姻重要性的减弱, 但如今婚姻作为核心社会制度的地位依然稳固。然而, 婚姻(包括再婚)的确在发生改变, 它变得不再普遍, 也变得越来越具有选择性: 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人才更有可能选择婚姻(和再婚)。这导致离婚率略有下降的同时伴侣关系(包括同居)的不稳定程度仍然很高。然而, 在已婚人群中, 离婚仍然是一个分层且制造分化的生命事件, 强化了既存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社会不平等。我们期待未来研究能在这些议题上更多地探究个体和社会情境的异质性, 以便能更有效地减少这些家庭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

## 写在文后

两位作者(按字母顺序排列)对本文具有相同的贡献。感谢亚历山德拉·基勒沃尔德(Alexandra Killewald)和朱迪斯·塞尔策(Judith Seltzer)对本文的评论和建议。本研究获尤妮丝·肯尼迪·施莱佛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Eunice Kennedy Shriv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人口研究中心(P2C-

HD041022) 和得克萨斯大学人口研究中心 (P2C-HD042849) 的资助。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官方观点。

附: 本篇作者凯莉·雷利 (R. Kelly Raley) 和梅根·M. 斯威尼 (Megan M. Sweeney) 代表作

Kuo, Janet Chen-Lan and R. Kelly Raley, 2016, “Is it All About Money? 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Women’s and Men’s Marriage Formation in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7 (8).

R. Kelly Raley and Charles E. Stokes, 2011, “Kin Connection; Kin Involvement While Growing Up and Marriage in Adulthoo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0 (2).

R. Kelly Raley and M. Kate Sullivan, 2010, “Social-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Romantic and Sexual Activity”, *Sociological Spectrum* 30: 65–89.

Johnsen, Sara and Megan M. Sweeney, 2022, “Female Sterilization in the Life Course: Understanding Trends and Differentials”, *Demographic Research* 48 (18): 529–544.

Megan M. Sweeney, Mieke Eeckhaut, and Jessica Gipson, 2020, “Reconsidering (In) equality in the Use of IU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loser Look Across the Reproductive Life Course”, *Demographic Research* 43 (35): 1049–1066.

Megan M. Sweeney M. and R. Kelly Raley, 2014, “Race, Ethnicity, and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Childb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0: 539–558.

## 参考文献

Addo, F. R., & Lichter, D. T. (2013). Marriage, marital history, and black-white wealth differentials among older women: Wealth differentials among older wom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2), 342–362. <https://doi.org/10.1111/jomf.12007>.

Amato, P. R. (2010). Research on divorce: Continuing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3), 650–666. <https://doi.org/10.1111/j.1741-737.2010.00723.x>.

Amato, P. R., & Beattie, B. (2011). Does the unemployment rate affect the divorce rate? An analysis of state data 1960–2005.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0(3), 705–715.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0.12.012>.

Amato, P. R., & Patterson, S. E. (2017).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union instability in early adulthoo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stabil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3), 723–738. <https://doi.org/10.1111/jomf.12384>.

- Andersson, G., Noack, T., Seierstad, A., & Weedon-Fekjær, H. (2006). The demographics of same-sex marriages in Norway and Sweden. *Demography*, 43(1), 79–98. <https://doi.org/10.1353/dem.2006.0001>.
- Aughinbaugh, A., Robles, O., & Sun, H. (2013). Marriage and divorce: Patterns by gender, rac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Monthly Labor Review*. <https://doi.org/10.21916/mlr.2013.32>.
- Badgett, M. V. L., & Herman, J. L. (2013). Patterns of relationship recognition by same-sex coup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 K. Baumle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the demography of sexuality* (Vol. 5, pp. 331–362). New York, NY: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94-007-5512-3\\_17](https://doi.org/10.1007/978-94-007-5512-3_17).
- Barr, A. B., & Simons, R. L. (2018). Marital beliefs among African American emerging adults: The roles of community context, family background, and relationship experienc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9(2), 352–382.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16644640>.
- Baude, A., Pearson, J., & Drapeau, S. (2016). Child adjustment in joint physical custody versus sole custody: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57(5), 338–360. <https://doi.org/10.1080/10502556.2016.1185203>.
- Bean, F. D., Berg, R. R., & Hook, J. V. W. V. (1996).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incorporation and marital disruption among Mexican Americans. *Social Forces*, 75(2), 593. <https://doi.org/10.2307/2580415>.
- Beaujouan, É. (2012). Repartnering in France: The role of gender, age and past fertility.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17(2), 69–80. <https://doi.org/10.1016/j.alcr.2012.03.001>.
- Becker, O. A., Salzburger, V., Lois, N., & Nauck, B. (2013). What narrows the Stepgap? Closeness between parents and adult (step) children in Germany: Closeness between parents and adult (step)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5), 1130–1148. <https://doi.org/10.1111/jomf.12052>.
- Bennett, N. G. (2017). A reflection on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union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Demographic Research*, 36, 371–390. <https://doi.org/10.4054/DemRes.2017.36.12>.
- Berger, L. M., Panico, L., & Solaz, A. (2018). Maternal repartnering: Does father involvement matter? Evidence from United Kingdom.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4(1), 1–31. <https://doi.org/10.1007/s10680-016-9410-4>.
- Bernardi, F., & Radl, J. (2014).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parental divorce for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emographic Research*, 30, 1653–1680. <https://doi.org/10.4054/DemRes.2014.30.61>.
- Bianchi, S. M., Sayer, L. C., Milkie, M. A., & Robinson, J. P. (2012). Housework: Who did, does or will do it, and how much does it matter? *Social Forces*, 91(1), 55–

63. <https://doi.org/10.1093/sf/sos120>.
- Bloome, D. (2017). Childhood family struct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54(2), 541–569.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7-0564-4>.
- Boertien, D. (2012). Jackpo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lottery wins on separ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5), 1038–1053.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2.01003.x>.
- Boertien, D., & Härkönen, J. (2018). Why does women's education stabilize marriages? The role of marital attraction and barriers to divorce. *Demographic Research*, 38, 1241–1276. <https://doi.org/10.4054/DemRes.2018.38.41>.
- Brand, J. E., Moore, R., Song, X., & Xie, Y. (2019). Parental divorce is not uniformly disruptive to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15), 7266–7271.
- Brown, S. L., & Lin, I. -F. (2012). The gray divorce revolution: Rising divorce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1990–2010.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67(6), 731–741. <https://doi.org/10.1093/geronb/gbs089>.
- Brown, S. L., Lin, I. -F., Hammersmith, A. M., & Wright, M. R. (2019). Repartnering following gray divorce: The roles of resources and constraints for women and men. *Demography*, 56, 503–523.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8-0752-x>.
- Brown, S. L., Stykes, J. B., & Manning, W. D. (2016). Trends in Children's family instability, 1995–2010.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8(5), 1173–1183. <https://doi.org/10.1111/jomf.12311>.
- Buehler, C. (2020). Family processes and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well-be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2(1), 145–174.
- Bumpass, L., & Raley, R. K. (2007). Measuring divorce and separation: Issues and comparability of estimates across data sources. In S. Hofferth & L. Casper (Eds.), *Measurement issues in family research* (pp. 125–143). Mahwah, NJ: Laurence Erlbaum.
- Bumpass, L. L. (1990). What's happening to the family? Interactions between demographic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Demography*, 27(4), 483. <https://doi.org/10.2307/2061566>.
- Bzostek, S. H., & Beck, A. N. (2011). Familial instability and young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3(2), 282–292.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11.04.014>.
- Bzostek, S. H., & Berger, L. M. (2017). Family structure experiences and child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irst nine years of life: Examining heterogeneity by family structure at birth. *Demography*, 54(2), 513–540.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7-0563-5>.
- Cancian, M., Meyer, D. R., Brown, P. R., & Cook, S. T. (2014). Who gets custody now? Dramatic changes in children's living arrangements after divorce. *Demography*, 51(4),

- 1381-1396.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4-0307-8>.
- Castro Martin, T., & Bumpass, L. L. (1989). Recent trends in marital disruption. *Demography*, 26(1), 37-51. <https://doi.org/10.2307/2061492>.
- Cavanagh, S. E., & Fomby, P. (2019). Family instability in the lives of American childre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5(1), 493-513.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073018-022633>.
- Chapman, A., Coleman, M., & Ganong, L. (2016). "Like my grandparent, but not":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skip-generation stepgrandchild-stepgrandparent relationships: skip-generation step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8(3), 634-643. <https://doi.org/10.1111/jomf.12303>.
- Cherlin, A. (1978). Remarriage as an incomplete instit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3), 634-650. <https://doi.org/10.1086/226830>.
- Cherlin, A. J. (2004).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848-861.
- Cherlin, A. J. (2009). *The marriage-go-round: The state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America today* (1st ed.). New York, NY: Knopf.
- Cherlin, A. J. (2017).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collection on separation, divorce, repartnering, and remarriage around the world. *Demographic Research*, 37, 1275-1296.
- Cherlin, A. J., Cumberworth, E., Morgan, S. P., & Wimer, C. (2013). The effect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on family structure and fertilit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50(1), 214-231. <https://doi.org/10.1177/0002716213500643>.
- Choi, K. H., & Tienda, M. (2017). Boundary crossing in first marriage and remarriag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2, 305-316.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6.08.014>.
- Cohen, J., & Manning, W. (2010). The relationship context of premarital serial cohabita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9(5), 766-776.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0.04.011>.
- Cohen, P. N. (2014). Recession and div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8-2011.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3(5), 615-628. <https://doi.org/10.1007/s11113-014-9323-z>.
- Cohen, P. N. (2019). The coming divorce decline. *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 5, 1-6. <https://doi.org/10.1177/2378023119873497>.
- Conger, R. D., Conger, K. J., & Martin, M. J. (2010). Socioeconomic status, family Processes,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3), 685-704.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0.00725.x>.
- Cooper, C. E., Osborne, C. A., Beck, A. N., & McLanahan, S. S. (2011). Partnership instability, school readiness, and gender dispariti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4(3),

- 246–259. <https://doi.org/10.1177/0038040711402361>.
- Copen, C. E., Daniels, K., Vespa, J., & Mosher, W. D. (2012). *First marri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ata from the 2006–2010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 (National Health Statistics Reports No. 49). Retrieved from <https://eric.ed.gov/?id=ED575480>.
- Couch, K. A., Tamborini, C. R., & Reznik, G. L. (2015). The long-term health implications of marital disruption: Divorce, work limits, and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benefits among men. *Demography*, 52 (5), 1487–1512.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5-0424-z>.
- Dahl, S. -Å., Hansen, H. -T., & Vignes, B. (2015). His, her, or their divorce? Marital dissolution and sickness absence in Norwa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 (2), 461–479. <https://doi.org/10.1111/jomf.12166>.
- Di Nallo, A. (2019). Gender gap in repartnering: The role of parental status and custodial arrangements: Gender gap in repartner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1 (1), 59–78. <https://doi.org/10.1111/jomf.12527>.
- Fomby, P. (2013). Family instability and college enrollment and completion.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2 (4), 469–494. <https://doi.org/10.1007/s11113-013-9284-7>.
- Fomby, P., & Bosick, S. J. (2013). Family instabilit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Family instabilit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 (5), 1266–1287. <https://doi.org/10.1111/jomf.12063>.
- Fomby, P., & Cherlin, A. J. (2007). Family instability and child well-be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 (2), 181–204.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0707200203>.
- Fomby, P., & Mollborn, S. (2017). Ecological instability and children’s classroom behavior in kindergarten. *Demography*, 54 (5), 1627–1651.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7-0602-2>.
- Fomby, P., & Sennott, C. A. (2013). Family structure instability and mobility: The consequences for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 (1), 186–201.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2.08.016>.
- Gatezewska, P., Perelli-Harris, B., & Berrington, A. (2017).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men’s repartnering behaviour in Europe: The role of individu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Demographic Research*, 37, 189–228.
- Ganong, L., & Coleman, M. (2017). *Stepfamily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interventions* (2nd ed.). New York, NY: Springer.
- Ganong, L., & Coleman, M. (2018). Studying stepfamilies: Four eras of family scholarship. *Family Process*, 57 (1), 7–24. <https://doi.org/10.1111/famp.12307>.
- Ganong, L. H., Coleman, M., & Jamison, T. (2011). Patterns of stepchild-stepparent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3 (2), 396–413.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0.00814.x>.

- Gates, G. J., & Cooke, A. M. (2011). *United States census snapshot: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4j23r1rx>.
- Gibson-Davis, C., & Rackin, H. (2014). Marriage or carriage? Trends in union context and birth type by education: Changing union contex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6 (3), 506–519. <https://doi.org/10.1111/jomf.12109>.
- Glass, J., & Levchak, P. (2014). Red states, blue states, and divorce: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onservative protestantism on regional variation in divorce r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4), 1002–1046. <https://doi.org/10.1086/674703>.
- Grätz, M. (2015). When growing up without a parent does not hurt: Parental separation and the compensatory effect of social origi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5), 546–557. <https://doi.org/10.1093/esr/jcv057>.
- Gray, E. (2015). Repartnering. In G. Heard & D. Arunachalam (Eds.), *Family formation in 21st century Australia* (pp. 101–121). New York, NY: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94-017-9279-0\\_6](https://doi.org/10.1007/978-94-017-9279-0_6).
- Hadfield, K., Amos, M., Ungar, M., Gosselin, J., & Ganong, L. (2018). Do changes to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 and family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instability hypothesis: Review of the instability hypothesis.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0 (1), 87–110. <https://doi.org/10.1111/jftr.12243>.
- Harkonen, J., & Dronkers, J. (2006).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educational gradient of divorce. A comparison of seventeen countri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5), 501–517. <https://doi.org/10.1093/esr/jcl011>.
- Hemez, P. (2017). *Divorce rate in the U. S. : Geographic variation*, 2016 (No. FP-17-24). Bowling Green, OH: 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 Marriage Research.
- Hewitt, B., Turrell, G., & Giskes, K. (2012). Marital loss, mental health and the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indings from six waves of an Australian population based panel study.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66 (4), 308–314. <https://doi.org/10.1136/jech.2009.104893>.
- Hiyoshi, A., Fall, K., Netuveli, G., & Montgomery, S. (2015). Remarriage after divorce and depression risk.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41, 109–114.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15.07.029>.
- Hughes, M. E., & Waite, L. J. (2009). Marital biography and health at mid-lif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50 (3), 344–358. <https://doi.org/10.1177/002214650905000307>.
- Impicciatore, R., & Billari, F. C. (2012). Secularization, union formation practices, and marit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Ita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 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 28 (2), 119–138. <https://doi.org/10.1007/s10680-012-9255-4>.
- Ivanova, K., Kalmijn, M., & Uunk, W. (2013). The effect of children on men's and

- women's chances of re-partnering in a European context.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 29 (4), 417–444. <https://doi.org/10.1007/s10680-013-9294-5>.
- Jansen, M., Mortelmans, D., & Snoeckx, L. (2009). Repartnering and (re) employment: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artnership dissolu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 (5), 1271–1293.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9.00668.x>.
- Jensen, T. M., & Shafer, K. (2013). Stepfamily functioning and closeness: Children's views on second marriages and stepfather relationships. *Social Work*, 58 (2), 127–136. <https://doi.org/10.1093/sw/swt007>.
- Jensen, T. M., & Howard, M. O. (2015). Perceived step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epchildren's perspectives.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51 (2), 99–153. <https://doi.org/10.1080/01494929.2015.1006717>.
- Kalmijn, M. (2013). Adult Children's relationships with married parents, divorced parents, and stepparents: Biology, marriage, or reside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 (5), 1181–1193. <https://doi.org/10.1111/jomf.12057>.
- Kalmijn, M. (2015). Family disrup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 Comparing the influences of married parents, divorced parents, and stepparents. *Demography*, 52 (3), 811–833.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5-0388-z>.
- Kalmijn, M. (2017). The ambiguous link between marriage and health: A dynamic reanalysis of loss and gain effects. *Social Forces*, 95 (4), 1607–1636. <https://doi.org/10.1093/sf/sox015>.
- Kalmijn, M., Loeve, A., & Manting, D. (2007). Income dynamics in couple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Demography*, 44 (1), 159–179. <https://doi.org/10.1353/dem.2007.0005>.
- Kamp Dush, C. M. (2013). Marital and cohabitation dissolution and parental depressive symptoms in fragile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 (1), 91–109.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2.01020.x>.
- Kennedy, S., & Ruggles, S. (2014). Breaking up is hard to count: The rise of div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0–2010. *Demography*, 51 (2), 587–598.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3-0270-9>.
- Killewald, A. (2016). Money, work, and marital stability: Assessing change in the gendered determinants of divor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 (4), 696–719.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16655340>.
- Kim, H. S. (2011). Consequences of parental divorce for child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 (3), 487–511.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11407748>.
- Kim, J. (2012).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in marital dissolution: Comparison of white and African American women. *Family Relations*, 61 (5), 811–824. <https://doi.org/>

10. 1111/j. 1741-3729. 2012. 00735. x.
- King, V., Amato, P. R., & Lindstrom, R. (2015). Stepfather-adolesc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ransitioning to a stepfami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 (5), 1179-1189. <https://doi.org/10.1111/jomf.12214>.
- King, V., Boyd, L. M., & Thorsen, M. L. (2015).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family belonging in step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3), 761-774. <https://doi.org/10.1111/jomf.12181>.
- King, V., Thorsen, M. L., & Amato, P. R. (2014).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epfathers and adolescent stepchildre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7, 16-29.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4.03.010>.
- Kreider, R. M., & Ellis, R. (2011). *Living arrangements of children: 2009* (No. P70-126; p. 28). Washington, DC: U. S. Census Bureau.
- Kreider, R. M., & Fields, J. M. (2002). Number, timing, and duration of marriages and divorces: 1996 (No. P70-80). Washington D. C. : U. S. Census Bureau.
- Kuperberg, A. (2014). Age at coresidence,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dissolution: 1985-2009.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6(2), 352-369. <https://doi.org/10.1111/jomf.12092>.
- Lau, C. Q. (2012). The stability of same-sex cohabitation, different-sex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 (5), 973 - 988.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2.01000.x>.
- Lee, D., & McLanahan, S. (2015). Family structure transitions and child development: Instability, selection, and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 (4), 738-763.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15592129>.
- Leopold, T. (2018).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A study of multiple outcomes. *Demography*, 55 (3), 769 - 797.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8-0667-6>.
- Lewis, J. M., & Kreider, R. M. (2015). *Remarri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No. ACS-30; p. 27). Washington, DC: U. S. Census Bureau.
- Liefbroer, A. C., & Dourleijn, E. (2006). Unmarried cohabitation and union stability: Testing the role of diffusion using data from 16 European countries. *Demography*, 43 (2), 203-221. <https://doi.org/10.1353/dem.2006.0018>.
- Lin, I. -F., Brown, S. L., & Cupka, C. J. (2018). A national portrait of stepfamilies in later life.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73 (6), 1043 - 1054. <https://doi.org/10.1093/geronb/gbx150>.
- Lin, I. -F., Brown, S. L., & Hammersmith, A. M. (2017). Marital biography, social security receipt, and poverty. *Research on Aging*, 39(1), 86 - 110. <https://doi.org/10.1177/0164027516656139>.
- Liu, H., & Umberson, D. J. (2008). 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 : Marital status and

- health differentials from 1972 to 2003.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9(3), 239–253. <https://doi.org/10.1177/002214650804900301>.
- Livingston, G. (2014). Four-in-ten couples are saying ‘I do,’ again.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 Lundberg, S., Pollak, R. A., & Stearns, J. (2016). Family inequality: Diverging patterns in marriage, cohabitation, and childbear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0(2), 79–102. <https://doi.org/10.1257/jep.30.2.79>.
- Manning, W. D., Brown, S. L., & Stykes, J. B. (2016). Same-sex and different-sex cohabiting couple relationship stability. *Demography*, 53(4), 937–953.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6-0490-x>.
- Manning, W. D., & Cohen, J. A. (2012).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marital dissolution: An examination of recent marriag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2), 377–387.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2.00960.x>.
- Manning, W. D., & Joyner, K. (2019). Demographic approaches to same-sex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 and divorce: Research findings, data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A. E. Goldberg & A. P. Romero (Eds.), *LGBTQ divorce and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 Psychologic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pp. 35–48).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S. P. (2006). Trends in marital dissolution by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ic Research*, 15, 537–560. <https://doi.org/10.4054/DemRes.2006.15.20>.
- Matysiak, A., Styr, M., & Vignoli, D. (2014). The educational gradient in marital disruption: A meta-analysis of European research findings. *Population Studies*, 68(2), 197–215. <https://doi.org/10.1080/00324728.2013.856459>.
- McLanahan, S., Tach, L., & Schneider, D. (2013). The causal effects of father abse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9(1), 399–427.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071312-145704>.
- McNamee, C., & Raley, K. (2011). A note on race, ethnicity and nativity differentials in remarri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ic Research*, 24, 293–312. <https://doi.org/10.4054/DemRes.2011.24.13>.
- Mitchell, C., McLanahan, S., Hobcraft, J., Brooks-Gunn, J., Garfinkel, I., & Notterman, D. (2015). Family structure instability, genetic sensitivity, and child well-be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0(4), 1195–1225. <https://doi.org/10.1086/680681>.
- Monden, C. W. S., & Uunk, W. J. G. (2013).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on dissolution and self-assessed health in European panel data.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 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 29(1), 103–125. <https://doi.org/10.1007/s10680-012-9269-y>.
- Musick, K., & Micheltore, K. (2015). Change in the stability of marital and cohabiting

- unions following the birth of a child. *Demography*, 52 ( 5 ), 1463 – 1485.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5-0425-y>.
- Musick, K., & Michelmore, K. (2018).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union stability in cohabiting and married families with children. *Demography*, 55 ( 4 ), 1389 – 1421.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8-0683-6>.
- Noël-Miller, C. M. (2013). Repartnering following divorce: Implications for older fathers' relations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 ( 3 ), 697 – 712. <https://doi.org/10.1111/jomf.12034>.
- O' Flaherty, M., Baxter, J., Haynes, M., & Turrell, G. (2016). The family life course and health: Partnership, fertility histories, and later-life physical health trajectories in Australia. *Demography*, 53 ( 3 ), 777 – 804.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6-0478-6>.
- Osborne, C., Berger, L. M., & Magnuson, K. (2012). Family structure transitions and changes in maternal resources and well-being. *Demography*, 49 ( 1 ), 23 – 47.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1-0080-x>.
- Özcan, B., & Breen, R. (2012). Marital instability and female labor suppl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8 ( 1 ), 463 – 481.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071811-145457>.
- Papernow, P. L. (2018). Recoupling in mid-life and beyond: From love at last to not so fast. *Family Process*, 57 ( 1 ), 52–69. <https://doi.org/10.1111/famp.12315>.
- Payne, K. K. (2018). *Change in the U. S. remarriage rate, 2008 and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gsu.edu/ncfmr/resources/data/family-profiles/payne-change-remarriage-rate-fp-18-16html>.
- Perkins, K. (2017). Household complexity and change among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4 to 2010. *Sociological Science*, 4, 701–724. <https://doi.org/10.15195/v4.a29>.
- Perkins, K. L. (2019). Changes in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emography*, 56, 525–548.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8-0757-5>.
- Prince Cooke, L., & Baxter, J. (2010). “Families”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Comparing institutional effects across Western societ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 ( 3 ), 516–536.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0.00716.x>.
- Qian, Z., & Lichter, D. T. (2018). Marriage markets and intermarriage: Exchange in first marriages and remarriages. *Demography*, 55 ( 3 ), 849–875.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8-0671-x>.
- Rackin, H. M., & Gibson-Davis, C. M. (2018). Social class divergence in family transitions: The importance of cohabitation: Diverging trends in family transitions by S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0, 1271–1286. <https://doi.org/10.1111/jomf.12522>.
- Raley, R. K., & Bumpass, L. (2003). The topography of the divorce plateau: Levels and trends in union st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80. *Demographic Research*, 8, 18.

- Raley, R. K., Sweeney, M. M., & Wondra, D. (2015). The growing racial and ethnic divide in U. S. marriage patterns. *Future of Children*, 25(2), 21.
- Raley, R. K., Weiss, I., Reynolds, R., & Cavanagh, S. E. (2019). Estimating children's household instability from birth to age 18 using longitudinal household roster data. *Demography*, 56(5), 1957–1973.
- Raymo, J. M., Fukuda, S., & Iwasawa, M. (2013).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in divorce in Japan. *Demographic Research*, 28, 177 – 206. <https://doi.org/10.4054/DemRes.2013.28.6>.
- Raymo, J. M., Park, H., Xie, Y., & Yeung, W. 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1), 471–492.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073014-112428>.
- Reinhold, S. (2010). Reassessing the link between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marital instability. *Demography*, 47(3), 719–733. <https://doi.org/10.1353/dem.0.0122>.
- Rendall, M. S., Weden, M. M., Favreault, M. M., & Waldron, H. (2011).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marriage for survival: A review and update. *Demography*, 48(2), 481–506.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1-0032-5>.
- Ribar, D. C. (2015). Why marriage matters for child wellbeing. *Future of Children*, 25(2), 11–27.
- Rosenfeld, M. J. (2014). Couple longevity in the era of same-sex marri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6(5), 905–918. <https://doi.org/10.1111/jomf.12141>.
- Rosenfeld, M. J., & Roesler, K. (2019). Cohabitation experience and cohabitation's association with marital dissolution: The short-term benefits of cohabit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1, 42–58. <https://doi.org/10.1111/jomf.12530>.
- Ross, H., Gask, K., & Berrington, A. (2011). Civil partnerships five years on. *Population Trends*, 145(1), 172–202. <https://doi.org/10.1057/pt.2011.23>.
- Ryan, R. M., & Claessens, A. (2013). Associations between family structure changes and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iming and marital birth.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7), 1219–1231. <https://doi.org/10.1037/a0029397>.
- Ryan, R. M., Claessens, A., & Markowitz, A. J. (2015). Associations between family structure change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income. *Child Development*, 86(1), 112–127. <https://doi.org/10.1111/cdev.12283>.
- Sayer, L. C., England, P., Allison, P. D., & Kangas, N. (2011). She left, he left: How employment and satisfaction affect women's and men's decisions to leave marria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6), 1982–2018. <https://doi.org/10.1086/658173>.
- Schneider, D., Harknett, K., & Stimpson, M. (2018). What explains the decline in first marri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1969 to 2013: Explaining the decline in first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0

- (4), 791–811. <https://doi.org/10.1111/jomf.12481>.
- Schnor, C., Pasteels, I., & van Bavel, J. (2017). Sole physical custody and mother's repartnering after divorce: Sole physical custody and repartner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3), 879–890. <https://doi.org/10.1111/jomf.12389>.
- Schnor, C., Vanassche, S., & van Bavel, J. (2017). Stepfather or biological father? Education-specific pathways of postdivorce fatherhood. *Demographic Research*, 37, 1659–1694. Retrieved from JSTOR.
- Schwartz, C. R., & Gonalons-Pons, P. (2016). Trends in relative earnings and marital dissolution: Are wives who outearn their husbands still more likely to divorce?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4), 218. <https://doi.org/10.7758/rsf.2016.2.4.08>.
- Schwartz, C. R., & Han, H. (2014). The reversal of the gender gap in education and trends in marital diss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4), 605–629.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14539682>.
- Schweizer, V. (2019). The retreat from remarriage, 1950–2017.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25035/ncfmr/fp-19-17>.
- Seltzer, J. A. (2019). Family change and changing family demography. *Demography*, 56(2), 405–426.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9-00766-6>.
- Seltzer, J. A., Yahirun, J. J., & Bianchi, S. M. (2013). Coresidence and geographic proximity of mothers and adult children in stepfamilies: Coresidence and proximity in step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5), 1164–1180. <https://doi.org/10.1111/jomf.12058>.
- Shafer, K., & James, S. L. (2013). Gender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differences in first and second marriage formation: Comparing first and second marriage form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3), 544–564. <https://doi.org/10.1111/jomf.12024>.
- Smith, C., Crosnoe, R., & Cavanagh, S. E. (2017). Family instability and children's health. *Family Relations*, 66(4), 601–613. <https://doi.org/10.1111/fare.12272>.
- Smock, P. J. (2000). Cohabi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ppraisal of research themes,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 1–20.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26.1.1>.
- Stanley, S. M., Rhoades, G. K., & Markman, H. J. (2006). Sliding versus deciding: Inertia and the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effect. *Family Relations*, 55(4), 499–509.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06.00418.x>.
- Steinbach, A. (2019). Children's and parents' well-being in joint physical custody: A literature review. *Family Process*, 58(2), 353–369. <https://doi.org/10.1111/famp.12372>.
- Suanet, B., van der Pas, S., & van Tilburg, T. G. (2013). Who is in the stepfamily? Change in stepparents' family boundaries between 1992 and 2009: Stepparents' family

- boundar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 (5), 1070–1083. <https://doi.org/10.1111/jomf.12053>.
- Sweeney, M. M. (2010). Remarriage and stepfamilies: Strategic sites for family schola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 (3), 667–684.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0.00724.x>.
- Tach, L. M., & Eads, A. (2015). Trends i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arital and cohabitation diss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52 (2), 401–432.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5-0374-5>.
- Tach, L. M., & Edin, K. (2013). The composi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union dissolution for married and unmarried par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50 (5), 1789–1818.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3-0203-7>.
- Tamborini, C. R., Couch, K. A., & Reznik, G. L. (2015). Long-term impact of divorce on women's earnings across multiple divorce windows: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26, 44–59. <https://doi.org/10.1016/j.alcr.2015.06.001>.
- Tamborini, C. R., Iams, H. M., & Reznik, G. L. (2012). Women's earnings before and after marital dissolution: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earnings records matched to survey data.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3 (1), 69–82. <https://doi.org/10.1007/s10834-011-9264-1>.
- Teachman, J. (2008). Complex life course patterns and the risk of divorce in second marriag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0 (2), 294–305.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8.00482.x>.
- Teachman, J. (2010). Wives' economic resources and risk of divorc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1 (10), 1305–1323.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10370108>.
- Thorsen, M. L., & King, V. (2016). My mother's husb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ow adolescents label their stepfather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3 (6), 835–851.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15599677>.
- Turney, K. (2017). The unequal consequenc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for children. *Demography*, 54 (1), 361–389.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6-0543-1>.
- Vanassche, S., Corijn, M., Matthijs, K., & Swicegood, G. (2015). Repartnering and childbearing after divorce: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parental status and custodial arrangement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4 (5), 761–784. <https://doi.org/10.1007/s11113-015-9366-9>.
- Wiemers, E. E., Seltzer, J. A., Schoeni, R. F., Hotz, V. J., & Bianchi, S. M. (2019). Stepfamily structure and transfers between generations in U. S. families. *Demography*, 56 (1), 229–260.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8-0740-1>.
- Williams, K., & Dunne-Bryant, A. (2006). Divorce and adul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larifying the role of gender and child 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8 (5), 1178–1196.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6.00322.x>.



- Williams, K., & Umberson, D. (2004). Marital status, marital transitions, and health: A gendered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5(1), 81–98. <https://doi.org/10.1177/002214650404500106>.
- Wu, H. (2017). *Age variation in the remarriage rate, 1990–2015*. Retrieved from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website; <https://doi.org/10.25035/ncfmr/fp-17-21>.
- Wu, L. L., & Martinson, B. C. (1993).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risk of a premarital bir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2), 210. <https://doi.org/10.2307/2095967>.
- Yahirun, J. J., Park, S. S., & Seltzer, J. A. (2018). Stepgrandparenth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73(6), 1055–1065, <https://doi.org/10.1093/geronb/gbx164>.